

中国传统文化、通识教育与金融学科的现代化

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 陈雨露

摘要：现代文明是历史的投影，一个失去传统文化的民族也不会有未来。新文化运动以来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争论不绝于耳，尽管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糟粕，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始终是维系中华民族血脉的象征体系。随着通识教育再次进入高等教育视野，传统文化成为其重点内容。具体到金融学，通识教育的目标是培养“东西方两个文化平台上自由往返和‘漫游’的人才”。在学习西方金融理论的同时，我们必须探索和发展根植于中国文明的金融学教育模式。

一、困惑与迷思

人类历史是无数伟大文化的剪影，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瑰丽与斑斓中迤逦，一个疑问会久久在耳边萦绕，为何拥有先进技术的古代中国没有孕育出工业革命，为何周礼中的泉府没有演进成现代金融体系。徘徊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字里行间，我们甚至不能寻找到答案的缥缈踪迹。

部分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否定态度，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提到“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虽然贸易会很自然地激起人们的信实，但却从未激起中国人的信实，他们买东西的人要带自己的秤”。孟德斯鸠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根植于封建权力，文化和礼仪只约束普通人，对权贵却毫无约束，中国传统文化所倡导的道德精神与国民行为恰恰相悖。韦伯认为文化是社会追求的体现，16 世纪席卷欧洲的新教（Protestantism）继承了文艺复兴的灵魂，“以身许主”的新教理念造就了辉煌的资本主义文化与经济。相反，中国古代社会是“依靠政治权力积累经济财富，城市贵族既没有封建印记也没有资本主义特征，而是靠政治投机，全靠升官（才可以）发财”，韦伯对中国传统文化核心——儒教与道教基本持否定态度，儒教和道教“缺少个性和独立司法，国家层面缺乏流动资本竞争”，因而不可能孕育市场经济。2006 年蓝德斯在《经济学展望》（Journal of Economics Perspectives）重要位置再次对中国传统文化提出了质疑：尽管古代中国孕育了灿烂的文化，尽管古代中国应用技术始终自我复制，但这种文化缺乏积累与升华，古代中国交易关系依赖个人信任、缺乏法律保护。兰德斯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社会忠诚、社会信任，社会进步几乎完全依靠个人努力，更可悲的是煌煌华夏中心论仍主宰当代中国文化，最终他得出结论“睡狮渐醒？绝不可能”。

任何国家和民族的今天都是从历史中走来，从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五四运动的“德先生”与“赛先生”，先贤们不止一次试图走出困惑，摆脱传统文化的悲观宿命。国民教育是屡被提及的自强救国途径之一，早在 1902 年中国高等教育的雏形“壬寅—癸卯学制”就提出高等教育要以“端正取向、造就通才为宗旨”。或许是出于学习西方科技

的急功近利，又或许缘起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误读，中华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官方宗旨却放弃了上述原则，1929 年制定的《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规定“大学及专门教育，必须注重使用科学，充实学科内容，养成专门知识技能”。梅贻琦先生清醒地认识到了其中的弊病，他提出“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窄，这样才可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梅贻琦虽然没有明确使用“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的概念，却洞悉了通识教育的本质。

一般而言，中国高等学府中的通识教育应当根植于饱受西方学者批评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能否冲破这个亘古迷思？以经济理性为根基的现代金融与“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的中国传统文化存在切点解吗？

二、通识教育释义与国学殇逝

（一）通识教育起源与内涵

“通识教育”起源于古罗马和中世纪大学的“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博雅教育以“七艺”为主要教学内容，即语法、逻辑、修辞、算术、几何、天文、音乐。古罗马和中世纪大学是现代大学的起源，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现代大学都秉承了其研究独立、言论自由的传统。英国剑桥、牛津两所大学是当时的典范，牛津、剑桥设立之初的主要目的在于培养具有“自由、公平、沉着、稳健和智能”的绅士。文艺复兴与工业革命后，剑桥、牛津等象牙塔出现了人文与自然科学并立的学术格局。大学不但为新兴资产阶级培养了专业技术人才，更主要的是缔造了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文化根基。人们经常以“绅士”代指英国人，实质是一种敬业、自由、开放的国民精神，正是这种文化使英国成为当时的世界翘楚。

随着美国成为世界经济重心，20 世纪上半叶“通识教育”开始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学府盛行，并由此衍生出芝加哥模式、哈佛模式、哥伦比亚模式等表现形式。透过纷繁的学分、学制等概念，美国通识教育的重点仍然是培育美国政治制度文化根基。“通识教育”是本科教育或者至少是初期本科教育的主要内容，通识教育课程并非逸兴所致的随意挥洒，“核心课程”要经过专门的委员会审定，教学内容、精泛读文献由全校最著名的教授确定。教学安排上课程内容也十分密集，以芝加哥大学人文学为例，芝大要求学生选在六七门课程中任选一门，但无论选择那一门都必须连续三个星期阅读柏拉图、莎士比亚、福楼拜、卡夫卡、康德拉等人的原著。通识教育教学方式非常灵活，注重学生团队合作精神。20 世纪 90 年代芝大曾开设过一门名为“财富、权力与美德”的通识教育课程，由本科学院院长主讲，20 多名博士做助教，助教与主讲院长每周沟通讲授内容，每个助教带两个班，每班 20 人，每周两次各 80 分钟的授课，考核方式为学生每两周交一次作业。

（二）国学与中国传统文化

在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探珠撷英，我们不禁惊讶于其瑰丽与华美：深邃而浩繁的诸子百家，壮阔而隽永的唐诗宋词，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朱程理学等等。在岁岁如斯、代代如是

的环境下,与其说中国传统文化是得以流传的先贤思想,毋宁说是维系民族认同的象征体系。古代中国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农耕文明,早在盛唐时代每个农业劳动力的原粮产量便达到4524市斤,这一数字足以令当时的欧洲瞠目结舌。任何现代文化都是历史的投影,传统文化不是现代的点缀,而是实用的、不可或缺的民族血脉。正如人不能离开社会,社会同样离不开传统文化,背叛自身传统文化的社会将注定消亡。

从文化发展视角来看,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兼收并蓄的综合文化。炎帝神农氏战胜东夷太昊伏羲氏的典故之源就是夏商文化冲突,公元前16世纪商文化容纳了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最终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根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是先秦文化涤荡中的佼佼者,此后数千年孔子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代表。孔子所谓的“罕言利”是斥责权贵聚敛,实际则提倡义利并重,主张“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儒家文化精神的本质更应该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孔子临终前告诉子贡:“天下无道久已,莫能宗予。夏人殡于东阶,周人于西阶,殷人两柱之间。昨暮予梦坐于两柱之间,予始殷人也”。孔子对古文化的眷恋、对儒家学说被异化的担心在临终慨叹中一览无余。果然,孔子及儒家思想在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被统治者伪装成了“利而巧”、“君子耻言利”,与其说这是后世儒生的误读,毋宁说这是统治者的有意安排。

数千年封建长夜中儒家精神也曾闪耀一时,宋代书院对以儒进仕进行了激烈批判。以四大书院(岳麓、白鹿洞、嵩阳、应天)为代表,儒学的真正继承者认为教育的关键是使弟子形成一贯的道德情操,书院教育不是弟子致仕捷径。诚如朱熹所言“古者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国。而其所以教之具,则皆因其天赋之秉彝而为之,品节以开导而劝勉之,使其明诸心,修诸身”。正是摒弃了仕进思想,书院文化才培养了大批宋、明、清各代名流(如王守仁、顾宪成、魏源),以书院文化自标的东林党人甚至发出“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的呐喊。与中世纪的西方大学相比,书院教育与大学“通识教育”殊途同归,教育中所积淀的文化遗产才是今天高等教育最弥足珍贵的大学精神。

鸦片战争以来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破了中国封锁的大门,西方思潮随之而来。尽管封建官僚将西方科技排斥为“奇淫技巧”,但也不得不惊叹科技手段带来的便捷。从严复翻译《天演论》到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从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到胡适的《独立评论》,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并把中国落后原因的矛头指向了被统治者异化的传统文化。然而新文化运动中新与旧、中与西并非形同冰炭,胡适在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中提到“我确信中国哲学的将来有赖于儒学的道德伦理从理性枷锁中得到解放。这种解放不能用大批西方哲学的输入来实现,而只能让儒学回归到原来的地位,也就是恢复它在历史背景中的地位”;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也曾提到“其实孔子精华乃在祖述儒学,组织有系统之伦理学说。宗教、玄学皆非所长。其伦理学说虽不可行于今世,而在宗法社会封建时代,诚属名产。其教忠、教孝、教从倘系施者自动行为,在今世虽非善制,亦非恶行”。

当代学者在解读新文化运动时却提出了“全盘否定论”,认为传统文化阻挡了中国现代

化的步伐，应该全部摒弃，美籍学者林毓生是这种思潮的代表。1949年后我国大学学科建设体系模仿前苏联模式。前苏联大学体制的特征是以专业划分高等教育结构，试图培养某一学科领域的“高级人才”。虽然这种集中化的大学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却摒弃了通识教育原则。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一批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财经学院由此诞生，同时浙江大学、南京大学等一批名校被肢解。1952年中国大学院系调整对“通识教育”的打击是致命的，人文学科因为“资本主义性质”被全盘否定，社会学、政治学甚至被取消了专业设置，与实用技术无关的国学则被摒弃出大学之门。1952年院系调整固然培养了大批工科、医科、师范类学生，但对人文学科、大学教育乃至民族文化的打击无疑是灾难性的，香港学者甘阳先生将之称为“大学的终结”。大学“通识教育”的本质在于孕育学生人文素养和科技创新能力，现代大学教育不同于技工学校，技能训练模式下学生可以很容易被训练成“匠人”却很难成为“大师”。

三、金融学发展与当代中国金融学“通识教育”

（一）金融学的概念及其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黄达教授（2001）指出“任何人文社会科学都摆脱不了本民族的文化根基。就金融学科来说，东西方的金融学科，也同样是分别根植于东西方文化平台之上。当然，金融理论的基本原理是导源于市场经济的本质，并从而有其不分国界、不分民族的普遍意义，但共同规律在不同文化平台上的显示，却决非必然雷同”。遵照黄达教授的界定，广义金融学研究范围包括“与物价紧密联系的货币流通、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体系、短期拆解资金市场、资本市场、保险系统以及国际金融等领域”。

现代金融产业发展早已超越了金融中介模式，获得了主宰世界经济的魔力，1929年美国股灾、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美联储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都充分显示了金融对世界经济的话语权。随着金融产业的发展，相关研究也进入了新的阶段，20世纪80年代后MM定理、VaR理论等一系列新概念几乎重构了现代金融学。总体上国外著名大学金融学教学存在两种不同的发展思路：“经济学院模式”和“商学院模式”。“经济学院模式”的核心课程是“货币经济学”和“货币金融学”，货币经济学侧重研究货币运行、金融产业对宏观经济的影响，重点是构建学科基础理论；货币金融学侧重微观层面，如风险敞口计算、货币政策制定与执行等。20世纪70年代之前“经济学院模式”是主流趋势，侧重基础理论发展，对金融业务的研究不充分。现阶段一个明显的趋势是“经济学院模式”被纳入宏观经济学研究框架，在任何一部国外流行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都有货币经济学相关理论，代表刊物是《货币、信用与银行杂志》（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20世纪70年代后“商学院模式”逐步兴起，该模式以公司财务和资本市场理论作为基本组成部分，独特之处是以金融工程、计量经济学、现代统计方法作为技术手段，对相关问题进行定量判断。“商学院模式”重视处理实际问题，对金融业务、机构管理的研究高度依靠计量模型，代表刊物是《金融杂志》（Journal of Finance）。尽管两种模式已经并存了近30年，但“商学院模式”为金融业发

展提供了操作技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是主流发展方向。

（二）当代金融的文化印记

中国当代金融学高等教育分为本科、硕士和博士三个层次，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例，本科培养目标是“具备坚实的金融学基础、较强数学功底、计算机及外语应用能力的应用型、实践型人才”，硕士培养目标是“有深厚金融学理论基础，掌握应用技能，具备很强的解决金融实际问题能力的高级金融人才”，要求博士具备“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备独立从事金融学研究的教学工作的能力，能主持较大型科研项目和探索重要金融问题的理论创新能力”。从上述三个阶段的培养目标来看，金融学本科、硕士教育主要是培养实践型人才，而博士教育主要是培养理论创新人才。通识教育对金融学高等教育异常重要，是因为社会行为理念决定了居民的金融行为，如果单纯移植西方金融理论，无论采用“经济学院模式”还是“商学院模式”都会使金融学高等教育脱离中国本土文化土壤。

在“经济学院模式”中 $M2/GDP$ 是衡量一国经济货币化水平的关键指标，20世纪90年代中国 $M2/GDP$ 突破 100%，按照“经济学院模式”这一指标快速增长可能会扭曲金融结构。如果结合中国传统文化，这一问题就不难理解了。西人常惊讶于中国的高货币化水平，但“成由勤俭败由奢”的传统理念却很容易解释上述问题。“商学院模式”所倡导的公司金融根植于西方“信托责任”(Fiduciary Duties)，16世纪所有者无法控制航行于浩瀚海洋的探险舰船，信托责任便由此诞生(Young, 2002)。随着英国皇室不再从事商业行为，普通法系逐渐成为公司金融的根基。在新教加尔文教派影响下，新大陆移民把新教伦理溶入“信托责任”，加之美国继承了普通法制度，“信托责任”获得了滋生土壤。非精英制度是普通法系的灵魂，在多数情况下陪审团成员都不从事法律工作，这种非职业化的法律制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简直匪夷所思。中国最初的公司源于清末洋务运动的“官督民办”，复兴于20世纪80年代初，资本市场在建立之初便与“信托责任”有着完全不同的制度内涵。虽然不能把中国资本市场全部问题归结于此，但银广夏、蓝田股份等一系列问题必定与缺乏“信托责任”有关。实际上，不仅仅是中国，欧洲大陆法系国家几乎无一例外是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单纯移植西方公司金融理论，忽略中国文化传统，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金融实务都不可能有所突破。进展。

（三）当代金融“通识教育”思辨

如果说缺乏“通识教育”，理工科高等教育仍然能培养出技艺高超的“匠人”，那缺乏“通识教育”的金融学高等教育则注定陷入“白马非马”的尴尬境地。西方金融学理论的哲学根基是经验主义。由经验主义衍生出个人主义，进而衍生出交易自由、经济自由、金融自由。一个明显的差别是中国金融根植于一个具有悠久集体主义历史的国度，居民对集体的信任要远强于对个人的信任。中国商业银行制度设计充分体现了这一特征，时至今日中国本土商业银行都有着浓厚的国家背景，与其说居民信任银行股东能管理好存款，毋宁说居民信任国家行政能力。也正出于对国家能力的信任，中国金融业渐进式改革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西方金融理论则难以解释资本充足率曾经偏低的银行为何能一跃成为世界一流银行。

毋庸置疑,西方金融学和金融产业目前的发展水平仍远在中国之上,向西方学习对提升中国金融产业发展、提升当代中国金融学高等教育的意义也毋庸讳言。20世纪80年代后期,当代中国金融学高等教育开始系统引入西方金融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高校相继翻译了一系列国外金融学经典原著,同时编写了诸多以西方金融理论为主体的金融学教材,提升了中国金融学教育水平,促进了金融学科发展。在引进西方金融理论的同时,我们不能忽视这些理论对受教育者潜移默化的文化侵蚀。中国高等教育生存于中国本土,无论在哪个层面,金融学高等教育都必须适应中国实际,这就要求我们对学生开展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的通识教育,以保证学生的中国文化印记。通识教育不仅能提高金融专业学生的人文素养,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在中西文明中找到结合点,进而成为黄达教授所言的“东西方文化平台上自由往返和‘漫游’的人才”。也只有通识教育才能奠定学生的中国式人文意识,在学习、实践、科研中探索,发展适合中国的金融改革道路。

如果将当代中国镶嵌在一个更加久远的历史背景中,通识教育对金融学、高等教育,乃至国家民族的意义就更加显而易见。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传统文化维持民族认同,失去自身文化的民族甚至很难延续。如果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及其文化理念真正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主流思想,中国不仅会成为文化上的碎片,也将成为经济上的碎片。同时,中西文化、教育也存在可融合性、共通性,“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菲薄明教之心”,扬弃传统文化并吸纳西方理论的先进部分,我们可以建立一个融贯中西的学术思想体系。

四、金融学科的新桃与旧符

1995年国家教委召开“文化教育试点会议”,高等学校开始把“通识教育”提上日程,自此各大学不同程度加强了人文教育。有观点认为,中国“通识教育”的改革途径有两条,一是大规模调整课程体系,模仿哈佛、芝加哥等名校建立本科学院,复旦大学的“复旦学院”即遵循这种路径,但成立本科学院涉及所有专业,不太可能断然在全国范围推行;另外一种方式是依靠现有师资力量,增加中国传统文化课程,这也是多数高校的做法。金融学科“通识教育”既有与其他学科的共性,又有自身特殊性。

中国传统文化“通识教育”必须与中小学教育衔接,如果没有中小学作基础,大学“通识教育”很可能成为空中楼阁。在我们现行的中小学教育体系中,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散落于语文、历史、思想、音体美教学,没有形成完整的教学体系。高等教育中的“通识教育”不应该是常识性教育,学生在接受高等教育之前就应该对传统文化基本了解,一个民族直至大学才进行传统文化基础教育,这无疑值得反思。

在金融学专业中通识教育必须达到以下几个目的:第一,使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完整了解,并形成以中国文化为底蕴、具备时代色彩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第二,培养学生文字能力,务使学生既能用浓墨重彩的语言描绘“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又能简捷勾勒出“枯藤,老树,昏鸦”;第三,培养学生团队精神,当前高校学生考核一直

针对个人,“通识教育”应该重点培养学生团队精神,一个可能的途径是考试以团队形式进行,并以团队成绩替代个人成绩;第四,加深对经典著作的认识,目前国内大学的普遍做法是开设“××导论”、“××概论”,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应该采取助教辅导下的原著阅读,授课重点应该是讨论而非讲授。

金融学“通识教育”的最终目标是推进学科整体建设,学生必须能接纳西方先进理论,进而学贯中西。任何高校都很容易拿出一个符合国际标准的课程设计体系,至于授课内容是否能与国际接轨、是否能建立扎实的金融学教育根基却考虑甚少。金融学主干专业课程设计必须突出各高校自身科研优势,并以此为基础形成自身的研究传统。国外著名经济学、金融学流派都是基于高校各自的研究传统,甚至多数学派都以学校名称冠名。

一流的金融学高等教育必定是国际化的,也必定拥有一流的学者团队,这就不得不提及人才培养与引进。在培养师资方面,引入具备良好国外教育背景的微观金融教学力量是学科建设重点。教师良好的文化素养也很重要,只有教师本人具备扎实的国学功底才能在专业教育中延续通识教育理念,使学生以中国文化视角审视西方金融理论。国际性学术交流也是提高金融学教学水平的关键因素之一,“取法其上仅得其中,取法其中仅得其下”,我们不但要“取法其上”,而且要让中国金融学教育直接成为“其上”。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当“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中国金融学教育的根基,中国金融便为投资机遇而存在,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永不泯灭的光辉。在回归中超越历史,这将是现代中国金融学教育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 陈雨露:《我国金融学专业教育的问题与分析》,中国大学教育,2007 年第 1 期。
2. 陈雨露等:《21 世纪中国金融学专业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年版。
3. 陈谷嘉:《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理念及人文精神再论》,大学教育科学,2006 年第 3 期。
4. 甘阳:《大学的终结》中国改革,2003 年第 8 期。
5. 甘阳:《大学通识教育的两个中心环节》读书,2006 年第 4 期。
6. 蓝德希:《为什么是欧洲和西方,而不是中国》,经济学展望,2006 年第 2 期。
7. 朗咸平:《现代公司治理与股票市场的理论与发展》,中国金融前沿理论(第 3 辑),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年。
8. 李良玉:《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全盘反传统问题——兼与林毓生先生商榷》,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 年第 2 期。
9. 黄达:《21 世纪中国金融学教学改革与发展战略》,财贸经济,2001 年第 11 期。

10. 杨树达：《论语疏证》科学出版社，1955 年。
11.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85 年。
12. 梅贻琦：《梅贻琦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年。
13. 韦伯：《儒教与道教》商务印书馆，1998 年。
14.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 年。
15. 陈山榜：《张之洞劝学篇评注》，大连出版社，1990 年。
16. 张杰：《天圆地方的困惑》，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 年。